

二十世紀
中國作家
懷人散文

主 編
馬蹄疾 陳漱渝

茅

盾

集

知識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茅盾集/陈漱渝主编;茅盾著.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5

ISBN 7-5015-1471-2

I. 二… II. ①陈…②茅…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112 号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福利工厂宏发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875 字数 118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1—6000

ISBN 7-5015-1471-2/I·81

定价:11.00 元

怀人以述志， 纪实以明史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序

陈漱渝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散文创作被视为收获至为丰饶的领域。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的这一结论，是对散文创作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评估。据统计，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中，小说、诗歌的出版量超过了散文集的出版量，但就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而言，散文小品的成就却超过了其他的文学样式。相对而言，散文创作所受外来影响也远比其他文体所受的外来影响微弱。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建设时期，不少散文作家在从事散文创作的同时，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更新观念，输入外国散文随笔理论。最早探讨现代散文革新的是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先驱者，但他们对散文的特性一时还难以界定，对散文语言提出的要求也局限于明白畅晓，简洁自然，即重视散文语言必具的朴实美，而无意中却忽略了追求使读者获得高层次审美愉悦的深邃美。有人将胡适散文比喻为水晶球，虽然晶莹剔透，但细看多时就渐觉乏味，就是这种理论必然导致的后果。促使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性散文诞生的是周作人。1921年6月18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美文》，公开提倡艺术性较强的散文小品。这种“美文”可偏重抒情或偏重叙事，也可抒情与叙事相夹杂，但无论属哪一种类型，都要以深刻的思想作灵魂，以真实简明为美

学标准。周作人还指出,要给新文学开辟出这块新的土地来,既要借鉴外国的美文(如英国的散文随笔),又要继承古典美文,如“序”、“记”、“说”的传统。这篇文章虽然短小,却成为了现代散文观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建设上,鲁迅也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他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率先在中国提倡闲谈体(或称娓语体)的散文。书中有一段话为当时的散文作者广为传诵:“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 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即有 humor(滑稽)也有 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

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家中,或强调散文的真情实感,或强调语言的独特旋律,或强调散文的时代脉搏,或强调散文的确切思想,或强调散文“美在适当”……直到 1935 年 8 月,郁达夫才对现代散文的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中指出,现代散文最主要的特征是,每篇散文里所表现出的作家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家的性格、嗜好、思想、信仰、气质无不在散文中得到纤毫毕现的流露。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比小说更具自叙传色彩。此外,现代散文不仅题材的范围扩大,而且对语言的要求也很宽泛,既可以使用典雅洁净的语言,也可使用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语言。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则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即散文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和社会,使作品达到“一粒砂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的艺术境界。五四时期散文作家的

上述理论，有力地推动了散文创作的繁荣。

就五四时期散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论，的确是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正如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一文中所概括：“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1926年7月31日《文学周报》）比如，按题材划分，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议论散文，有胡适、瞿秋白、孙伏园兄弟等人的游记散文，有焦菊隐、高长虹、于赓虞等人的抒情散文。按风格而论，冰心的散文委婉雅丽，周作人的散文冲淡自然，许地山的散文联想丰富，徐志摩的散文词藻富丽，以至有时“浓得化不开”。以文体而论，则有闲谈体，随笔体，格言小诗体，自由体，抒情体……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为日后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圃中，怀人散文是一支独秀。这是介于散文和传记之间的一种文体。它既具有散文的特质，又具备了传记的特征——以真实人物为记叙对象，可以剪裁提炼，不可虚构想象，类似于古代正史传记之外的“杂传”。早在二十年代，朱金霞先生与陈源先生讨论传记文学时，曾谈及这种文体中“史”的因素与“诗”的因素结合的艰难。他以撰写孙中山传记为例指出：“替中山先生作传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长于文学的，不见得同时对于中山先生生平晓得很清楚，而立传却一方面是要注重事实的，这样，结果只能成一部寻常的小说；而很清楚中山先生生平的，不见得同时又长于文学，而革命家的事迹又多少总带点枯燥性的，这样，结果恐怕不免弄得面孔死板，令人读了头痛。”（《西滢闲话·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朱先生的上述见解可谓是经验之谈。但在怀人散文的作者

笔下，“史”与“诗”的矛盾却往往迎刃而解。因为他们首先是文人，可以拾贝为纸，折柳当笛；跟传主之间又有着直接的交往，素材来自于亲历、亲闻、亲见，对其人的生平史实可说是烂熟于心，因而又可以立碑写人，刻简记史，使作品不仅富于文学性，而且富于史传性。

清代文学家袁枚在《小仓山房文集》中说：“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卷三十《答戴园论诗书》）。怀人散文写作的基本原则就是传真，即再现缅怀对象真实的生活片断，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符合人物的真实语气，真实神态，真实气质，使读者如睹其形，如聆其声，如结交其人。怀人散文不等于人物的功德碑或编年史，而只是透彻剖析人类心灵与行为动机的载体。因此作者不仅要写出缅怀人物的业绩或平凡处的闪光点，而且还不应讳饰人物的弱点、缺点、局限性，以生动的细节立体化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血肉之躯。古希腊作家、《亚历山大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说得很好：“美德或者恶行并不总是在最光荣的事业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通常倒是某些细微的举动，只言片语或一颦一笑，较之阵亡数万人的会战，千军万马的调动和攻城掠地的壮举，更能显出人物性格。”

作为现代散文的一个分支，怀人散文在艺术性上自然也有自身的追求，如语言的生动精炼，结构的精巧缜密，情节的繁简有致……凡此种种，都应围绕着一个重心，即刻画人物丰富多彩的性格，揭示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展示人物人格形态的生动性。简而言之，就是要“传神”。“神”者，个性也。无论是以形写神，略形写神，或形神兼备，都只是为了使作者笔下的人物成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不过，跟人物传记比较起来，怀人散文并不追求人物生平的完整性，而往往只是抒写作者情感激流中的一幅倒影、作者记忆林荫下的一片残叶、作者心灵潭水中的一朵行云，因而对传主个性的揭示不可避免地带有更鲜明的主观

色彩,字里行间也无不渗透着作者本人的修养情趣、秉性气质。

怀人散文贵在“传真”,重在“传神”,而志在“传情”,即抒发作者对缅怀对象的敬仰、思念或悼惜之情。《罗丹艺术论》中有一句名言:“艺术就是感情。”怀人散文与一般抒情散文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作者和描写对象之间有着直接的感情纠葛,由于两地睽离,或生死乖隔,情感的激流就会冲出闸门,奔突汹涌,不可遏止。完全可以说,怀人散文的写作过程,就是感情流泻的过程,就是以思念使故人形迹影留,以追怀使旧友音容再现的过程,所以跟其他文体的创作相比,怀人散文的情感应该更鲜明、更真挚、更强烈。这是决定创作成败得失的关键。

怀人散文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跟其他散文门类相比,其史料价值显得尤为突出。历史是由千百万民众的多方面活动谱写的,任何人的生平,只要是如实加以记叙,都会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怀人散文的作者大多是文化人,其抒怀对象也往往是文化圈里的知名人士。为研究这些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的生平提供第一手的生动资料,是怀人散文具有的独特功能。美国传记文学大师欧文·斯通在谈到创作杰克·伦敦传的体会时写道:“凡在杰克·伦敦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每一个人,我都加以寻求,加以访问,从他们取得资料。我有时觉得,这些人为了使杰克·伦敦的传记圆满无缺,才都活在世上了。”(《马背上的水手·序》)感谢那些优秀怀人散文的作者,他们不仅在作品中表现了高远的精神境界与旷达的人间情怀,而且以其提供的大量素材丰富了无数杰出人物的传记,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可亲、可信、可敬。

如同西方传记文学的繁荣始于冲决教会精神罗网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我国现当代怀人散文创作的高潮第一次出现在打破偶像的五四时期,第二次出现于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也就是说,只有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确认和尊重,怀人散

文的花朵才有赖以生长繁茂的社会土壤。怀人散文倍受读者青睐的另一层原因,是因为二十世纪已经快走到了它的尽头。在本世纪当中,人类经历了两次影响深远的世界大战和数不胜数的局部战争,经历了使不少善良人为之目瞪口呆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中国人民遭受的内患外侮似乎更多一些。为了迎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明天,为了替子孙后代谋求一个更为合理、更加美好的生存环境,人们都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总结历史的经验。无数真实的人的真实一生,或其一生中的若干真实片断,集合起来就是一幅大时代风云翻卷的真实而壮阔的历史画面。这将促使现代史学突破御用史官的既成模式和从个人直觉出发解释历史的做法,让历史一步步贴近于它的本来面貌。可以断言,怀人散文为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等各门学科提供的滋养,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珍惜和重视。

本套丛刊选收的怀人散文,均出自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手笔。但由于不同作家政治倾向、写作风格不同,也由于所收诸篇写作时期不同,不同的选集呈现的特色也各不相同:有的词藻富丽,有的冲淡自然,有的激越奔放,如浩浩江流;有的含蓄委婉,如潺潺泉水……对人物的品评因作者思想立场不尽相同也会有得当、不尽妥当和失当之分。因此,读者对人物的理解评价不能完全以作者的主观好恶为转移,这是必须予以说明的。因资料所限,对诸文篇主的注释有详有略,亦盼读者谅解。

目 录

- (1) 写于悲痛中
- (3)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 (7) 永远年轻的韬奋先生
- (9) 记香港战争时韬奋的琐事
- (12) 悼念胡愈之兄
- (17) 悼六逸
- (20) 忆谢六逸兄
- (26) 忆冼星海
- (30) 我所见的陶行知先生
- (32) 悼佩弦先生
- (34) 忆钱亦石先生
- (36) 马达的故事
- (43) 记李汉俊
- (45) 萧楚女与恽代英

- (48) 一段回忆
- (51) 回忆秋白烈士
- (56) 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
- (59) 不能忘记的一面之识

- (65) 我的家庭与亲人
- (89) 童年

- (121) 卡泰耶夫访问记
- (126) 西蒙诺夫访问记
- (136) 悼念 A. 史沫特莱女士
- (138) 中国人民的亲热朋友

写于悲痛中

十 九日下午三时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给我的急电，报告鲁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雳！我不能相信！双十节下午，我到上海大戏院去看苏联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着鲁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们坐在一处，谈了好多话。双十节离十九不过八天，我怎么能够相信会出了这样大的乱子！

然而电文上明明写着“周已故”，这“周”不是“大先生**”还有哪个？不是他还有哪一个“周”能使我妻发急电来促我速归？

然而我却因为痔疮发作，卧在床上动不得。我恨极了这一次忙里偷闲的旅行！我发了个回电。仍旧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够勉强就道，夜里我躺在床上，回忆着双十节和鲁迅先生在上海大戏院里的谈话，又回忆着十月二日（或三日）我和 G 君到鲁迅先生家里给他拍照那一个下午的谈话，又痛苦地猜想这次的“晴天霹

* 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姓周，本名樟寿，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

** 大先生：参见《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篇中注。

雳”的来由。凭那两次最后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鲁迅先生会突然于十九日逝世，虽然和 G 君去访他那一次回来时，G 君在车中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面色和精神比我意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我又记起史沫特莱女士在八月初离上海去避暑时，也对我说：“他此时虽然好的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转地疗养！他自己总说不要紧，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乐观的呵！”八月中旬，鲁迅先生拣定了转地疗养的地点是日本镰仓。可是后来又不果行。夏天却已过去了。九月中我晤见他，他说暑天已过，索性再过几时，或者到香港去换换空气。谁知道十月中旬忽然这晴天霹雳！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若能把转地疗养这问题很早布置的妥贴，则鲁迅先生不至于因有事实上的一些困难而迁延了这三个月的功夫，我们太不负责，我们这罪不能宽饶！我们太不中用了！

十九日一夜，在这样悲痛回忆中过去。二十日清晨，我跳起来决定乘早班船再转火车，可是痔痛如割，刚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没有法子瞻仰最后一次的遗容了！

“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这是 G 君在十月二日和我去访鲁迅先生后回来时的话。但是，但是我们太不宝贵鲁迅了，我们没有用尽方法去和鲁迅的病魔斗争，我们只让他独自和病魔挣扎，我们甚至还添了他病中精神上的不快！中国人的我们，愧对那几位宝爱鲁迅先生的外国朋友！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七卷第五号）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的下一天，A. 史沫特莱通知我，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在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型鸡尾酒会，请我参加，并说当天晚上八点钟她开车来接我同去。晚上七点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里等候她。这家咖啡馆是一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莱经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大约将近八点钟，史沫特莱来了，说车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见汽车停在马路对面，是辆黑牌车（那时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车是黑牌）。史沫特莱自己开车。我们一直开进了外白渡桥旁边的苏联总领事馆。

参加鸡尾酒会的约二十多人，国际友人中我只认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论坛》的编辑，是一对夫妇。中国人中有鲁迅，许广平，郑振铎，好像也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大家随便吃一些东西，随便交谈。史沫特莱悄悄对我说，她和一些朋友都很关心鲁迅的健康，觉得他脸上缺乏血色，又听说常有低烧，容易疲劳。他们都希望鲁迅能够转地疗养。苏联早就

想请鲁迅去游历并疗养，请他全家都去。怎么走？由何人伴送？苏联方面会很妥当地给安排的。

史沫特莱又说，这件事她已同鲁迅谈过，但鲁迅犹豫不决，因此希望我帮助促成鲁迅的决心。

隔了两三天，我到鲁迅家去，同他谈起这件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作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

我就问：“为什么呢？”

鲁迅说：“一旦到了苏联，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

我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

鲁迅又说：“我所谓聋子和瞎子还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

我说：“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

鲁迅听我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道：“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

我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够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鲁迅听我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我换了一个话题，又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似乎容易办了。”

我这个话似乎引起了鲁迅的思考。

我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有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

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力的日报和期刊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一点短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我猜想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我这番话又引起了鲁迅的思考，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罢，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得成的。”

这样，我就告别了。回家后我写了封短信给史沫特莱，大意是：大先生（鲁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同志们背后常以“大先生”称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鲁迅家去。鲁迅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前些时候，敌人在造谣，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曾到青岛去住了一个多月。而周扬他们竟也就此推波助澜。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鲁迅说这些话时有点兴奋，眼睛看着我，眼光是沉着而坚定。我心里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决心。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状态是大家关心的。”

鲁迅回答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我觉得我已无能为力。鲁迅的战斗精神那样坚决，使我也不能再多嘴了。

第二天，我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鲁迅经常发低烧，出国疗养之事也就无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后，鲁迅一场大病，朋友们又提起这件事，但那时鲁迅的健康状态已不适宜远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镰仓小事休养（见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给我的信），但

最后还是没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他突然病发，终于不起。

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原载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学》第六期）

永远年轻的韬奋* 先生

初见韬奋先生总觉得他不过三十多岁，不但他容貌使你
有此感觉，他的言谈举止都表示他绝对不是饱经忧患的五十左
右的人了。和他相处稍久，你便会觉得估量他有三十多岁也还太
多，实在他好像只有二十来岁。比现在有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更
为“年轻些”的一个中年以上的人。

有许多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言谈举止方面当然也有韬奋
先生那种活泼和热情，至于容貌不用说，自然会比不见老的韬奋
先生更为“后生”，然而，恐怕未必能有韬奋先生这样的天真！对
人的亲切，热情，对事的认真，踏实，想到任何应该办的事便马上
想办，既办以后便用全副精神以求办得快，办得好，想到人世间
一切的黑暗和罪恶便愤激得坐立不定，看到了卑劣无耻残暴而
又惯于说谎的小人，满嘴漂亮话而心事不堪一问的伪善者，便觉
得难与共戴一天——这些都是韬奋先生的永远令人敬仰之处，

* 邹韬奋(1895—1944)新闻出版家。原名恩润，笔名韬奋，江西余江人。